

青年研究中的时间与空间

■ 方 俊 肖 峰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要求青年研究必须建立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鲜明的时空特征相融合的科学理论框架。尽管社会的建构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社会存在只有在历史和地理中才能成为具体,但正如现代社会理论对时空问题的忽视一样,青年研究长久以来也不大重视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或尽管引入了时空概念,但其视角却有问题。这种对时空的不合理处置在实际研究中造成了诸多困难,影响了青年研究理解和解释青年现象的效度。在这个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中,青年研究需要拓宽其时空视野,尤其是利用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机遇,走进历史,用长时段的方法观察问题,进而挖掘历史变革更深层的规律和延续性。

【关键词】青年研究 时间 空间 社会性

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内容丰富,直指当下青年群体面临的问题和处境。在理论上,《规划》为青年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必将青年研究乃至青年学的学科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就青年研究的现状而言,还需大力改进才能适应《规划》的要求。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青年研究在学科建设方面仍旧是处于前学科阶段的话^[1],当今青年研究领域社会学、青年工作、教育学三家争鸣的喧嚣景象更是无法掩盖青年研究在赶时髦、功利化、碎片化的同时学术规范不够和理论基础不牢的实际困境^[2]。《规划》虽然没有明言青年研究该如何摆脱上述困境,但其强调的“中长期”特征及其出台的历史背景却在实际上为青年研究明示了方向。如果青年研究界能正视这个问题,建立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鲜明的时空特征相融合的科学理论框架^[3],对青年研究乃至青年学科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具有中国时空特征的青年研究理论框架,首先必须关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

一、时间的根本性及其在既有视野中的误用

就青年研究的对象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年而言,青年研究同时间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然而,

收稿日期:2018-03-22

作者简介:方俊,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青年学理论;
肖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哲学。

对青年研究而言,时间这个范畴的相关性远不止于此,在某种意义上,时间是青年研究中最根本的东西。首先,青春期从童年而来,并不可避免地将转变为中年。其次,时间不仅使青春有别于童年和中年,也使青春期具有不同于童年和中年的稳定性。因为青年群体的任何行为模式都是通过时间之中形成并经过时间检验才得以确定的。再次,对于追求秩序的青年研究而言,时间也是秩序的核心。正如英国哲学家摩尔所言,没有时间秩序就不会有秩序^[4]。最后,青年研究不仅研究“青年”在历史时间中的出场方式、受历史时间影响的种种形态,也把时间作为测量青年思维、身体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标准。因此,时间范畴不仅是青年研究中的内生变量,还是人们理解青年思想和行为的关键所在。

尽管时间对青年研究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但并非所有的青年研究都重视时间。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等著作中批评社会学家总是习惯于将时间和空间视为行动的环境一样,许多青年研究仍然没有对时间表现出应有的关注。另外,在那些重视时间并因此采用时间化研究方法的青年研究中,大多采用类似10年这种常规的时间尺度来研究各种时段的青年群体,更别提那些将结论建立在简单的统计分析基础之上的研究了。由于只关注脱离时间的社会对青年的影响,在主流的青年研究中,时间要么不被视为一个说明性的变量,要么只是在随后的证明中作为一个简单的注脚。社会的建构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社会存在只有在历史和地理中才会成为具体^[5]。由此观之,时间、空间也是青年生活的基本要素,同时重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才能更好地解释青年问题与青年现象。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与被归结为物理形式而被严重忽略的空间相比,社会科学研究中优先考虑时间的倾向使得时间在青年研究中得到的待遇还是比空间更好一些,这一点在社会学取向的青年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一取向分析,通常按以下四种不同的方式使用时间^[6]:其一,将时间看作一种有助于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构成的要素,在这里,时间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社会意义。例如,1919年5月4日对理解青年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就具有一种特定意义,青年在话语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都可以追溯至这一事件。其二,将时间看作社会诸种要素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正是因为时间,事件的意义才得以显现。比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意味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当今大部分青年研究都将这一时间开启的历史事件作为影响青年思想和行动的背景因素。其三,将时间视为一种可以量化的测量工作,比如,青年研究中经常采用常规时间作为自己的时间尺度,这种方法经常以10年为尺度对各种时段的青年群体给予特别关注,诸如80后、90后、00后的相关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其四,将时间视为一种质的测量尺度,以前述80后、90后为主题的青年研究来说,所考察的不仅是这10年间出生的青年在成长过程中面临何种差异化的环境,同时也考察这两个年龄段的青年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上存在何种质的不同。

以上几种方式表明了时间在青年研究题材尤其是社会学取向的青年研究题材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但这并没有充分挖掘时间在理解和解释青年中的作用。尤其是当前青年研究的现状已形成了以社会学、青年工作、教育学为取向的三种相互竞争的多元化格局,其中,社会学越来越成为主流的研究方式^[7]。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取向的青年研究就没有问题。在知识爆炸、信息广泛传播的今天,社会学取向的青年研究较为看轻非实证化的人文研究,认为后者学术规范程度不够、理论分析水平不深。实际上,社会学取向的很多青年研究也仅仅是停留在对一些具体现象的深层解构当中,而非在学术自觉和方法论自觉的前提下寻求将现象与本质的研究加以结合^[8],最终无非是打着科学研究旗号的解释学狂欢罢了。究其根源,尽管社会学取向的青年研究善于对青年现象进行解释分析,但他们在整体上过于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充分考虑时间的作用。当他们考虑到时间的时候,更多的是将时间视为一种因果关系,就像他

们认为社会变迁和互联网是影响青年的重要变量一样;或者,他们也将时间视为一种可以量化的测量工作,就像他们对80后、90后开展的诸方面研究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时间并没有发挥它作为“历史视野”的作用,如青年研究中对青年的历史认识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结果是,尽管它们考虑了时间的作用,但很多关于青年存在和青年现象的解释仍然是不合适的^[9]。

以青年婚恋观这个热点问题为例。目前,相关学界有许多关于80后、90后婚恋观比较的研究。这类研究发现,相比80后更注重经济条件而言,90后更在意双方的生活习惯与人生观念^[10]。对于这种差异,相关研究也确实从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解释了原因,比如经济方面,80后成长于社会经济由相对落后到迅速发展的阶段,90后成长于社会经济由“又快又好”到可持续发展的阶段,丰富的物质条件使他们的其他需求得以成为可能^[11]。问题在于,90后婚恋观的这种特征,在80后知识精英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同通常所说的80后相比,80后知识精英的婚恋观更接近于90后的婚恋观^[12]。同理,如果能对90后中经济水平较差的群体的婚恋观展开研究,也不难发现他们的婚恋观更接近于人们通常对80后婚恋观的理解。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相互矛盾的现象呢?

问题仍然在于相关研究不合理地使用了时间这个范畴。从表面上看,用时间这种可以精确衡量的分析变量来测量青年群体在质和量的方面的变化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时间并非一种可以脱离空间和社会而单独使用的工具。对时间的正确使用,只有将它同空间、社会这样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才是可能的。上述关于80后、90后婚恋观的比较研究之所以无法准确描述现象,在于80后、90后这些概念本身就只是一种划分时间的常规尺度,它不过是社会学家在叙事中用10年这个时间尺度选取不同的研究对象的产物。但是,这种时间尺度选取的是历法中的自然时间,它同那种掺杂着社会因素和空间结构的社会时间是不同的。这种社会时间,作为社会的产物,是一种由人在既定空间中生产出来的社会建构。关于这种社会时间的差异,马克思就曾说过,“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13]。换言之,考虑到空间和社会的差异,即使是00后,如果他们来自尚未接入互联网世界的贫困山区的话,其婚恋观仍然有可能接近首先强调经济条件的80后。

在某种意义上,许多研究选择这种常规的时间尺度,并且拒斥对青年群体的历史性考察,是由于他们在关注社会变迁的同时也没有摒弃社会结构的持久性特征。就他们聚焦青年的生活世界并成功发掘了不同青年个体和群体的历史细节和鲜活特征而言,这种聚焦于时间中的片段研究的确有其优点。然而,这种利用时间的研究方法也有一个缺点,对短期内的现象分析使之过于关注“现在”,也就是过分聚焦变化。问题在于,社会并非总是如此变动不居的。走进青年的历史,人们能够发现,许多忽视时间或者误用时间的青年研究所挖掘出来的现实危机和阶段性特征实际上遮蔽了历史变革更深层次的规律和延续性。因此在推进青年研究进一步适应《规划》的要求中,需要我们防止让时间和空间成为青年研究中缺席的变量,妥善处理好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的关系,妥善处理好时间、空间之间的关系。

二、空间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研究中的艰难性

同时间相比,空间与青年研究似乎没有那么紧密的关系。尽管如此,常识告诉我们,人们所生活的社会始终是可以标识在地图上某块区域的一个点,这就意味着个体总是处于某个既定的空间中。反过来,人们也无法脱离具体的对象去谈论抽象的空间,空间只能存在于对象之中并通过对象而存在^[14]。对有些人而言,空间仅仅是人类活动中一个不那么重要的物质基础而已,重要的是立于其上的社会关系。对另外一些人而言,空间对于理解人类活动具有重要作用。比

如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就认为,空间改变了生产关系,它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15]。两种不同的观点在青年研究中多有体现,持前种观点的人视空间差异为影响青年活动中的一个偏离常态的因素,因而有意或无意忽视空间在理解青年群体时的重要作用。持后种观点的人则将空间性视为青年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它影响了青年的日常活动,体现在青年参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并在青年成长中留下印迹。

在忽视空间的作用方面,教育取向的青年研究表现得尤其明显。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为例,在中国知网的数据库中,查找篇名含“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字眼的文章,能搜索到超过2万条结果。但是,这些研究中绝大多数关注的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解读、内容分析和对策阐释,鲜有研究专门探讨特定空间中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更别提深入考察大学校园这个特定空间是如何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过程,相关核心素养又是如何在大学生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留下印记的了。如果说这类研究同空间有一点关系的话,它们也仅仅是在“中国”这个总体的空间背景下阐述自己的思想,至于其中具体的空间结构如何影响大学生行为及其社会关系则鲜有提及。

这种将社会和社会关系从空间中剥离出来的做法不过是日常思维的常态而已。在日常思维中,人们习惯性地空间与社会或社会关系随意加以分离与重新结合。例如,人们习惯将城市看作上层社会聚集的地方,然后拒绝认为农村生活的人可能拥有城市本地人引以为豪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与此同时,对于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之类的概念,人们又习惯性地用它们来描述群体而非某个地理空间。这种随意分离与重新结合空间的做法,不仅体现在忽视空间的青年研究中,也屡见于认为空间性与青年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青年研究中。

这一点在最近发表的以农村青年社会流动成长史为对象的研究中就表现得相当明显^[16]。在该个案分析中,作者认为,相比备受关注的城市青年而言,农村青年属于被忽视的群体,尽管他们努力在经济地位上向上攀升,由于文化资本的匮乏,他们始终游离在上层社会之外,成为城市中的流浪者,最终陷入自我意识分裂的异化之境。显然,这种价值性的评价术语意味着作者眼中的农村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的空间,它是一个充满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问题在于,空间是一个兼具社会属性和地理特性的范畴。当人们谈到空间是社会关系的真实展现而非偶然反映,甚至认为空间就是社会再生产的场所时,这种空间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空间。与此同时,空间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构造物,作为地理空间,它先于人类存在,因而只具有部分社会属性。因此,当农村这个空间被片面地强调为政治空间时,这种忽视农村这个空间的地理特性的观点同那种忽略空间的理论并不存在本质差异。

在这里,如果说农村青年和农村这个空间的关系被错误地结合在一起的话,上层社会群体同空间的关系却被明显地分离开来。一方面,由于不适当地将农村这个空间视为政治空间,农村文化被错误地视为价值上低于“上层社会”的文化,农村青年被错误地认为千方百计向上层社会靠拢的群体。这样,当农村青年为了提升经济地位而牺牲文化趣味时,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他们必须忍受无法融入上层社会的幻灭与彷徨,成为精神上孤独的异乡人和无法回“家”的流浪者。另一方面,这个“上层社会”身处何地,除了美术馆外,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趣味却从未加以详细阐述。与空间在理解农村青年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相比,上层社会的文化趣味显然是超越空间限制的自在存在。实际上,在每一个社会中,“上层社会”都会刻意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在不同地区“上层社会”的文化趣味也存在天壤之别。不仅如此,“上层社会”并非仅仅使自己有别于农村青年,它也努力使自身有别于包括城市青年在内的所有他者,并且会随时改变自己的趣味以彰显自己的独特性。如此厚此薄彼,自然会得出农村青年陷入了自我意识分裂的异化境地。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如果将时钟前拨,回到 21 世纪之交的中国,那时候情况也许如此。那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远没有达到现在的水平,互联网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更是陌生事物,青年农民比照的是香港和上海等少数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巨大的差距确实容易使农村青年产生无力感^[17]。但是,如今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是远超当年,农民群体中不乏富裕家庭,农村青年也能自由通过互联网同外界甚至外国接触,农村和城市之间生活方式的差异在很多方面已经明显缩小。不仅如此,如今包括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在内的青年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互联网文化的影响,而后者本身是由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的使用者而非农村或者城市这个更加“硬”的物质空间的使用者推动的。此外,近年来,诸如《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节目的热播,社会对包括农村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愈发重视,意味着文化趣味正在成为普罗大众的刚性需求^[18]。如此,便无法再认为农村青年在文化趣味上总是“仰慕”“上层社会”。

从历史角度分析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成长史不难发现,这个流动过程不过是人类文明几千年发展史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在历史长河中,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本身就是一部人口逐渐从农村向城市聚集的历史,接受教育不过是农村青年进入城市的诸多方式中的一种。在这种人口迁徙的过程中,时间与空间不可避免地交错汇集在一起。尽管这种时空转换会使个体产生不适,甚至使个体感受到像一个被卷入其中的他者,但这种不适是暂时的,个体很容易应对这种变化,进而能够从容地在农村和城市这两种不同场景中自由切换。认为这种时空转换会导致个体自我意识分裂的观点,既忽视了个体通过重新解释世界而自我调适的能力,也是在互联网时代高估了所谓“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对普罗大众的吸引力。

由此可见,正如时间对青年研究的重要性一样,空间对科学的青年研究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如此,如何在具体研究中处理空间这个范畴,面临着非常明显的困难。继续以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成长史研究为例,如果人们把农村青年同农村这个独特空间的关系抽象化,因而将农村视为影响青年行为的稳定背景,好像全国农村的青年都受到曼海姆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熏陶而具有类似的精神气质,那么人们就不可能指望在这种分析中发现农村青年向上流动的多种模式,也无法发现农村青年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社群等事实。另一方面,即使我们汇总各个空间的具体事实,部分不能等同于整体的关系也意味着这无助于解释全国层面的事实,因为这涉及到每一位努力向上爬升的农村青年的成长经历。即使采用实证的方法,我们也无法找到对全国各地都适用的农村青年社会流动规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教育学取向的青年研究习惯性地忽视空间,而社会学取向和青年工作取向的许多研究尽管注意到了空间却未能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这一现象。由于在具体研究中处理空间面临这种困难,大卫·哈维认为,任何社会理论纳入空间和地理这一问题都会导致自身的核心命题不再成立^[19]。因此,人们要么继续对空间加以随意分离与结合,要么干脆弃之不顾,视为一个不太重要的背景因素。

三、长时段研究与大数据时代的机遇

在某种意义上,青年研究中的上述时空特点是与中国当前社会的时空结构分不开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亘古未有的社会变革进程,互联网的兴起又加快了社会分化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给青年研究提供了太多的工具和选择,使之能够对变幻多端的青年现象进行各种解读。如果这种争夺还包含有学科之间为了谋求自己地位和发

展“私心”的话,那么研究的功利主义倾向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正是青年研究的这种“现实关怀”,使其视野过于聚焦“现在”这一历史时刻。但由于它们在总体上缺乏历史视野,又无视空间的重要作用,最终要么成为专注于某一狭隘场域的碎片化叙事,要么成为一种脱离时空的自

言自语。

因此,忽视或者误用时间、空间这两个维度,对于致力于理解多变的青年现象的研究带来了明显的不良后果。不管是无视时空的以教育学和青年工作为取向的青年研究,还是用常规时间尺度考察青年思想和行为的以社会学为取向的青年研究,尽管它们的确发现了存在于青年问题和青年现象中的大量细节,也挖掘了不同于宏大叙事的青年群体的多样性,并产生了数量可观的论文,但正如在80后、90后婚恋观比较研究中出现的自相矛盾一样,这些研究对时间尤其是对与空间纠缠在一起的社会时间的忽视或误用显然无助于挖掘存在于青年群体中的历史危机和周期性特征。如果说忽视时空维度的青年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假定存在着超时空的青年本质的话,只关注当下的青年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误以为时间总是预示着变化。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的时空特征也发生了改变,其建构意义也愈发受到人们关注。这种变化既呼唤青年研究关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更要求青年研究在进一步挖掘时间作用的同时也要实现空间转向,以改变过去只单向地强调社会对空间的影响,或只强调时间或者社会对空间的影响。正如苏贾所言,建构一种更富有弹性和更折中的批判理论,需要重新将历史的构建和社会空间的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唯有如此,才能从这种富有创造性的结合中生成出各种可能性^[20]。

在这一方面,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的将历史视为时间、同时又关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发展的长时段理论可以提供有用的资源借鉴^[21]。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的历史具有规律性的观点相类似,布罗代尔也主张,如果人们以数世纪或数千年为尺度的历史叙事来观察社会,就会发现聚焦于“现在”的短期主义所没有发现的诸多结构。以80后、90后婚恋观比较为例,研究发现随着时间流逝带来了不同年龄的青年在婚恋观上的显著差异,尽管人们可以因此认为社会充满了流动性。但是,如果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时间带来的并不全是变化,它也带来了稳定。吉登斯以当代社会的学校教育为例,发现学生、老师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具有一种“返回”的特性^[22],正是在这种不断返回中,日常生活的重复特征结晶化为某些相对稳定的结构。由于这些结构是在时间中不断重复才形成的,因而这种稳定性是一种动态稳定,而非静态稳定。当然,这种稳定的结构化特征并不意味着无视时空的青年研究就是合理的,相比那些本质主义的观点,这种结构是历史的总结,因而具有历史性。

相比仅仅重视可测量性的短时段研究而言,长时段研究不仅意味着用更长的时间尺度去观察问题,而且也考察那些在背景中看似不那么重要的因素,后者能够更好地解释诸种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长时段研究并不排斥人文学科所重视的偶然性。对青年而言,很多偶然发生的事件,对个体乃至群体的思想和行为都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对那些使用定量测量方法去探寻因果关系的研究而言,如果他们希望人们相信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就必须结合青年个体或群体的自我反思行动来解释可能导致结论不成立的偶然事件。当然,引入长时段研究,也并不意味着否定仅仅强调可测量事物的短时段研究,许多优秀的青年研究尽管关注的是短时段内的青年现象,但微言之外亦不乏大义,比如沈奕斐的《个体家庭 iFamily》揭示了以个体为中心但受制于社会条件而代际关系紧密的家庭模式,陈映芳的《青年与历史变迁》将中国青年的角色担当置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巨变的历史洪流中。毋宁说,引入长时段研究的要义仍然在于,社会世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过于复杂,忽视或者误用这两者容易赋予青年群体本没有的统一性,或沦陷于碎片式的差异性。

那么,面对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时空结构,青年研究又如何才能挖掘处于不同具体时空中的青年群体和个体的特征和规律性呢?处于信息时代的青年研究也许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做法,从大数据研究中寻找新的启示。当今时代是一个大数据时代,

其中,既有人类仅凭人力所无法解读的海量数据,也有使处理这些数据成为可能并从中得到有用结论的互联网和相关设备如云计算。在这样一个时代,大数据对包括青年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代替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学科持续有用的求索,也迫使他们更要对越来越复杂的问题进行解答^[23]。想想那个80后、90后恋爱观比较的例子,有缘网数据中心及有缘网用户调研中心利用大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在诸多方面同专门的社会学研究得出的结论都高度相似,甚至在很多方面还超过了后者。由于大数据大幅提高了采集历史信息的能力,因此为研究者获取并分析来自不同时空的数据提供了方便。有了这些数据,研究者可据此确定多层次的因果关系,认清哪些现象是青年的偶发特征,哪些又是青年群体的本质性的稳定特征。总之,大数据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基础,有助于我们探知青年的历史和过去,然后有针对性地回应当下世界的需求,并更好地理解青年的未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时空结构,其中,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改变。社会变迁是以代际变迁的形式展开这个事实意味着,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青年并非惰性的受动群体,他们的成长史本身就展现了这一社会变迁的过程,他们不仅参与了历史的建构,也参与了空间的生产。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只有理解青年、观察青年,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空特征。由此观之,在青年研究中,时间和空间不仅是影响研究方法和结果的外在变量,更是人们理解青年群体和青年现象的内在构造。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的历史转向、近年来历史学中重回长时段研究都具合理性的话,那么青年研究也有必要深化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在充分挖掘时间作用的同时实现空间转向,在引入长时段研究的同时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以求对多样复杂的青年现象及其蕴含的实在本质做出更恰当的揭示。

[参 考 文 献]

- [1]黄志坚《学术研究与普及应用:论加强青年学研究之双轨并进》,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期。
- [2][7]李春玲《社会变迁与中国青年问题》,载《青年探索》2018年第2期。
- [3]景天魁《建立具有中国时空特征的理论框架》,载《人民日报》2004年10月28日。
- [4]Moore, W. E. ,Man, Time and Society, New York: John Wiley, 1963, p. 8.
- [5][20]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3、19页。
- [6]约翰·哈萨德《时间社会学》,朱红文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7页。
- [8]黄 海《田野、叙事和结构:青年研究的人类学进路》,载《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2期。
- [9]田 杰《青年研究:敞开历史视野》,载《青年学报》2017年第2期。
- [10]《90后恋爱大数据》,http://www.sohu.com/a/157382200398736
- [11]高中建 李艳艳《90后与80后大学生的婚恋观及其差异性研究》,载《青年探索》2013年第2期。
- [12]马 妍《传统观念与个人理性的碰撞:80后知识精英婚恋观研究》,载《青年研究》2012年第9期。
-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 [14][19][22]德雷克·格利高里 约翰·厄里《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53、104、281页。
- [15]Lefebvre, H.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Antipode, 1976, Vol. 8(2), pp. 30-37.
- [16]胡 勇《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当代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成长史》,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2期。
- [17]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5页。
- [18]《文化趣味正在成为一种刚需》,http://epaper.ynet.com/html/2017-02/14/content238628.htm
- [21][23]乔·古尔迪 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孙 岳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10页。

(责任编辑:王俊华)